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一期 ——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0 1 1 d)

【亡灵论坛】《我家》追忆遇罗克殉难前后	章海陵
音在弦外——在《我家》发行座谈会上的发言	梅 娘
哭读《我家》	俞 衡
狱中遇罗克	张郎郎
遇罗克和他的时代	张敏采访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 【史海钩沉】

《我家》追忆遇罗克殉难前后  
• 章海陵 •

近十年来，“文化大革命”的话题不仅退出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出版物，也退出了中国人的记忆，新一代人说不清文革的来龙去脉，甚至不知道“四人帮”。但时光隧道真的能够一片白净清洁吗？不，隧道的拱顶突然透出了殷红的痕迹，这是文革冤灵的鲜血，它从来就没有乾涸过。

文革年代惨遭当局杀害的人权思想家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最近撰写和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我家》，以纪念其兄殉难三十周年。《我家》问世，市场反应热烈，好评如潮，打破了亲历文革那代人的内心平静，惊心动魄的回忆苏醒了。人们重新记起，中国跟荒谬而又凶暴的极左路线决裂，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谁想得到神州大地出现了比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黑暗的人权歧视现象。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

人权歧视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在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纵容下，先是北京郊区大兴县，再是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受害者唯有听天由命，像弱小动物一般孤苦无告，然而在高举的屠刀下，连他们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这血淋淋的屠杀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永难洗刷的耻辱。

遇罗克品学兼优，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就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又经营铁工厂。遇罗克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刻苦研读从马克思到卢梭的大量名著，进行艰苦探索。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无比猛烈的批判。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也冒犯了文革当局。遇罗克一九六八年初被捕入狱，七零年三月五日惨遭处决，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遇罗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也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谓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克说，他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他读著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著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遇罗克热爱生活。他在牢房里帮助过许多人，跟难友一道回忆《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差不多有三五百首。遇罗克还背熟了《橘中秘》、《梅花谱》等棋谱，能跟别人下盲棋。他也留恋生命，他故意说跟大名鼎鼎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有关系，让当局白费力气四处调查，为自己翻案争得了一段长时间。遇罗克在法庭上恳切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材料核实一下，听听我个人的申诉。”但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遇罗克生前最惦念的是外婆。年近七十的外婆操劳一生把他们从小带大，遇罗克很怕她听到自己的噩耗受不了打击。在遇罗克的遗物里有件崭新的白背心，自一九五七年以来，遇家家境贫寒，罗克从没穿过好衣服。他在狱中穿的背心已破烂不堪，就写信让家里人买件新的。等母亲把买好的新背心带给他时，他已知道自己要告别人世了，决定把新背心留给弟弟穿，自己穿著一身旧衣走上刑场。

如今已是卓越发明家和工程师的遇罗文对亚洲周刊说：“我家两代六口人，却有四人六次跟铁窗结下不解之缘，可是我家始终是一个和睦、真诚而温情的家庭。

”就在大部份子女于监牢和劳改队受苦受罪之际，遇家父母却派出身边唯一的小儿子遇罗勉，千里迢迢前去东北看望朋友孙钢的父母，孙纲原先是《出身论》的热心读者，后来跟遇家兄弟成了好友，受牵连进了监狱。

遇家的亲子之爱和手足之情，是多舛命运给予他们最丰厚的补偿。遇罗文在《我家》中写道，具有文学和美术天赋的姐姐遇罗锦，在六六年北京红卫兵满城抄家的时刻，因保留舍不得烧掉的哥哥日记而被当局送进劳改队。有一天，遇罗锦突然回家，问其原因，原来劳改队偶然批准她探亲。这时，母亲就要下班回家，弟弟们担心母亲的神经受不了太大的刺激，让姐姐先躲起来。母亲进了家门，孩子们东拉西扯说姐姐可能会回来，直到母亲慢慢有点思想准备了，弟弟才让姐姐露面，母女抱者一起，默默地流泪。

遇家小儿子罗勉探望在东北劳改队的姐姐罗锦，是《我家》一书最感动人的篇章之一。在管教干部的面前，姐弟不敢谈论长兄遇罗克，拥抱告别时，两人刷刷地流泪。可是遇罗锦万万没想到，小弟还会来看她，“第二天天还没亮，小弟已来到路边。等呀等，终于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走过来。一队队的人流在凌晨黝黑的天幕下无声地走过去，只听到踢踢踏踏连成一片的脚步声和队长们的吆喝声。突然，他在一个队伍中发现了扛著锹的姐姐，他招手，姐姐也看见了他。他哭了，她也哭了。”

姐姐后来跑到一个山冈上，向小弟招手。这时监工队长假装没看见，而在场的一些女劳教队员也跟著呜咽流泪。这是满天阴霾的文革岁月中，美丽人性挑战和战胜丑恶制度的辉煌时刻。可惜，中国的苦难太多了，持续的时间也太久了。

遇罗文和遇罗勉后来在陕北收到家信，得知哥哥遇罗克的不幸消息，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他们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怀念的敬爱的哥哥。罗文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遇罗文没想到的是，在哥哥惨遭处决后，父亲伤心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而儿女心极重的母亲却没流一滴眼泪，从这一刻起，她主动担当了支撑全家精神的角色。可是强烈的悲愤仍毁坏了她的健康，这位早年曾是游泳运动员、看似没病没痛的母亲，竟在六十多岁时突然告别了人世。

∞ ∞ ∞ ∞ ∞ ∞ ∞ ∞ ∞ ∞  
音在弦外——在《我家》发行座谈会上的发言  
• 梅 娘 •

《我家》的作者遇罗文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我家》的恳谈会，您去吧！我去接您。电话匆匆，既没说由谁主持，也没有说开会地点。我自忖：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去谈《我家》这本书，这是我对故人的义务，用不着知道什么，就是得去。如此，我来到了座谈会的现场。原来这不是个简单的恳谈会，刊书的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社内一级领导亲临，请了诸多媒体。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这场合对我来说似曾相识，我只担心退居边缘的我，会不会给大会带来不合谐的音符。幸亏我稍稍打扮了自己，穿上了那条平时嫌它鲜艳的红地花裙，在黑上衣上配上了珊瑚胸针。我是隆重地来参加恳谈会的，我盼望能够与开会的主旨相合、能够从容地品读《我家》所反映的，一直令我和我的同辈人暗暗饮泣的那段历史。喜庆和悲怆交替缠绵着我。我竭力使自己平静、平静。谁知，一看见罗勉，我的心便乱了。

罗勉正低头摆弄着照相机，那个侧脸跟我们在政治学习班上他父亲遇崇基的脸相一模一样，我和遇崇基相遇的时候，他也就四十刚过。父子在不同时空的这个年

龄段上的巧合，涵盖的岂止是通常的悲欢离合。我控制着自己，为亲眼目睹的遇家父子在完全相异的场合中的亮相，欣喜、悲怆，说不清是种什么滋味。

我和遇家的交往，源起于我和遇崇基同在东四派出所的政治学习班上。我俩的罪由也大同小异，都曾是日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曾有过沦陷生活的短暂经历。遇崇基比我的名声大，他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主持过营造公司，还盖过什么竹筋楼。我曾在文坛上舞文弄墨，写过小说、当过杂志的编辑。我们回国时都是风华正茂，都是放弃了日本的优厚生活条件，志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就带来了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猜想。虽然劳动教养期间，左查右查并没找到我们作为日本间谍的真赃实据，有人依然不放心，将我们交由街道实施群众专政。我们同在东四地区住家，便成了学习班的同学。《我家》中涉及的遇罗克，当时是工厂的学徒工，这个书生气的小青年很喜欢我。只要看见我跨进他家的门槛，便会溜出去买几块熏干加在大锅熬白菜中招待我。他含笑向着我：“孙姨，您感觉怎样，熏干熬白菜，真是一等一的好菜，您说呢？”这一等一的好菜我几乎是含泪咽下的。我清楚，这几块熏干是罗克在寒风里奔波一个小时的车钱。于是，我便尽量不在吃饭的钟点到他家去。却拒绝不了老遇的劝诱。学习班下课，老遇说，顺路到我家去坐一会吧！罗克喜欢和你“争论”。老遇用日文说的“争论”，用的是现在时的进行式，我懂得那邀请的诚挚。

少言寡语的遇崇基用了个吓得我双腿发软的冒险办法传给我一份已经流传得急风骤雨似的《出身论》。当时，居委会派给我一项赎罪的任务，一定及时、准确把领袖的最新指示写在黑板报上，单写不行，还得加花加框，以示隆重。板报旁边居委会的门洞里，有个旧牛奶箱。我被允许把彩粉笔、彩纸条等用具放在牛奶箱里。想想吧！当我在一片大好形势的剪报下看见了《出身论》的当儿，岂止惊骇万状，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谁传给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串连，我怎么办？我毕竟已经饱餐风雨，首先清醒地断定：这是朋友送来的。当时，给我的信件要先送到居委会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给我。不利用邮递而利用牛奶箱，这是胆大心细的人出的绝招儿，肯定是遇崇基干的，他熟悉我办报的细节。虽然胆战心惊，我仍然从容地在板报上画上了个光芒被掩的半个太阳，寄托了我的难言之情。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怕惊动芳邻，扶起架子跌坐在木椅上，索性关掉了为深夜绣花装上的白亮亮的管灯，沉入黑暗之中，嘴里叨咕着：论得好！论得真好。一细想。恐惧便来了，意识到，这文章怕要捅大漏子，可我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立时果断决定，再不能到遇家去，绝不能给遇罗克增加一条与日本特务勾搭的罪状。

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受管制的人在各自居委会的监督下，投入挖洞的义务劳动。老遇和我不在一个居民组，天赐绝面良机，可却难以放下对罗克处境的忧心。一天，趁着黄昏暮霭，罗克突然来到我家，指着那个我给他补过的旧帆布书包，从书包中拿出一包东西来放在桌上，向我从容一笑，说：“爸爸请你分享希望！”说了这句含意模糊的话便转身走了，我还没从他的突然出现缓过劲来，他已经消失在胡同深处了。那是一小包白米，包在那条我熟悉的遇崇基劳动时擦汗的旧毛巾里，连看带琢磨，才把老遇那龙飞凤舞的日文草篆理顺看明白。写的是：陈总给我翻译围棋谱的机会，得了一点想都不敢想的稿费。米到我手里，是挥汗的炎夏，直到春节，那米一粒也没动。罗克已经进去了，我看见白米便想哭，完全不忍用它来填补饥饿。那是一握真情，我一定要在希望实现之时才吃，那才能吃出香甜。当时，我靠绣花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遇家六口人，只有遇妈妈的六十多元工资，白米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过于奢侈了。耽读《我家》，心潮激荡，我完全没有料到当年那个半大小子遇罗文，会如此精明地梳理了那段岁月，用平实自强的生活反击了荒谬的时代。遇崇基要我分享的希望。由他的儿子送来了。出版社的白米饭我是和老遇、罗克共享的，我吃得份外香甜。

罗克生前，愿意听我讲楚辞。当问及我为什么要回祖国时，我把一直激励自己的屈原的警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以为这个心之所善，是人、是民族的精魂。《我家》潜含了这点。我为《我家》祝福。这篇短文。不是评书，是对故人的怀念，请原谅我的音在弦外。

□ 原载《博览群书》2000年第8期，作者本名孙嘉瑞。

∞ ∞ ∞ ∞ ∞ ∞ ∞ ∞ ∞ ∞ ∞

哭读《我家》

• 俞 衡 •

当我读完遇罗文先生所著的《我家》后，一直噙在眼眶里的泪水已禁不住潸然而下。

四十岁以上的人或许忘不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血雨腥风的一幕，但对这段历史总是不愿做过多的回顾，甚至对记述与反思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类著作执某种拒斥的态度，似乎这样就能使这段历史在人们的头脑中尘封起来。

这种让时间掩遮血泪，让忘却抹杀惨痛，让现实冲淡苦难，让未来放弃过去的思维，已成为一种定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某种性格的构成。于是不论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人，还是正意气风发的中年人或是追寻新理念的青年人，似乎都一起开始只愿讴歌当前的太平盛世，而对那段本应最铭心刻骨的岁月却不愿再去提及。然而善于遗忘的民族总是容易被事件的重演所耍弄，这是历史在久远的重复后得出的铁证。遇罗文先生正是本此意蕴而对自己一家在那段时日的惨痛经历给予了真实的讲述，希望能借此给世人一点醒示，一点悸动，使人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还曾有过那么悲怆的一段历史。

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仅仅因为一篇反驳血统论的文章就残遭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一朵思想的鲜花就如此凋谢，被淹没在无情的充满罪恶的神权迷信的喧嚣中，被绞碎在以国家名义的专制的子弹下，用自己宝贵的生命给那段沉重的历史平添了一份沉重，用自己真诚的呐喊给那段荒诞的岁月论证着荒诞，于是他被当时的人们所误解，为当时的时代所不容，更被当时控制着全国局势的一小撮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类，作为必须杀一儆百、儆千、儆万、儆全体国人的罪人，他的死就成了不能避免的悲剧，就注定要在我们这个自称“有远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民主”的国度中发生。

和被割开喉管而死的张志新烈士相比，我不知道遇罗克是幸或不幸，因为尚未找到他遇害时受到哪些令人发指虐待的据证，这或许是因为张志新倒在了“四人帮”垮台的前夕，是在这伙人已预感到自身灭亡时最穷凶极恶的残忍，使烈士张志新承受着法西斯的暴行，于是在今天，她被授予了烈士的称号，虽然张志新烈士已无法享受到这一切，但起码她的家人还可以领取到一点待遇，使烈士的在天之灵有所欣慰吧？然而遇罗克却是在“四人帮”正烈焰凶热，一手遮天时倒下的，以致直到平反也没有得到烈士的称誉，他的父母和家人当然也就没有资格享受烈士家属的待遇了，这位思想的前驱带给家庭的除了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外就只有无休无止的悲思与最苦痛的追忆，这就更令人世间感到一种悲愤的凄怆，留给了人们最惨淡的碑记。

遇罗文一家即使在遇罗克被杀害前都未能见他最后一面，他们的父母，两位立志报国，专程从海外回国的知识分子的后半生，一直在痛怨与绝望中生活，爱子被杀都不敢在人前表达自己的哀伤，为了其他几个孩子的继续活存，两位老人只能默

默地无言地承受这一残忍的结局，而不能更不敢有丝毫不满的情感流露，试想这种灭绝人性的悲剧竟能发生在已经自诩建立起人类间最美好社会的距今并不很远的年代，怎不令人长歌当哭，扼腕而叹呢？不幸是值得深深地同情与怜悯，但怜悯与同情却绝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当遇罗文一家从五十年代就开始饱受人间劫难，仅仅因为是私营企业主，父亲就可以在“三反”“五反”中没有任何证据而被做为贪污嫌疑对象，就可以被关押、被逮捕，母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查，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几乎没有自己任何的权利，不能为自己的清白作任何的辩白和申诉，一切都只有依赖组织的意见和决定，个人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运动中早已成为任人割宰的羔羊，都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让运动牵着你的鼻子走，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与抵触，就是这样，仍可能难逃厄运，遇罗文的父亲不正是按照组织上的要求说了句“人和人，冷冰冰”的话就被打成右派，几近三十年的光阴，他家六口人倒有四口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全家一直过着如同噩梦般的日子，蒙受着那不断降临的恐怖与灾难。遇罗文兄妹几人恐怕除了不懂事的孩提时代曾享受过一丝快乐外，就一直过着万人所指、群情激昂的指点与批斗的生活，这需要付出多少身心的代价，铭刻下多少苦痛的回忆！

这一切都是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的，是在人类已走过几千年的文明时发生的，每个人都应当认真地对之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素有文明礼仪之邦美称的国度发生这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丑恶和暴行？有人认为这只是当时“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结果，其实不然，应当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一种情结的体现，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几千年积淀的一种定时爆发。且不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明清两代的那种令人发指的虐酷，不就很能说明这点吗？国民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使多少无辜者倒在血泊中，苏维埃反AB团又使多少没有死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被残忍地枉杀，延安时期的整肃乃至解放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都是以某种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全都一脉相承地宁左勿右，这就充份表明在我们这个民族中占据的主要思想意识就是封建一元，不论谁，只要一当政，就要把自己的思想做为唯一正确、不能反对甚至连怀疑都不能产生的正统思想，就要让全体人民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属都俯首帖耳、都大颂英明、都行动一致、都要对不同于统治者声音的观念斥之为异端而大加鞭挞，从太平天国洪秀全到现在一些包工头，哪一个不是这样？所不同的不过仅仅在于形式或方法罢了。

遇罗克曾对陈伯达在痛骂蒋介石的书中把毛泽东说成“智勇双全”“弥天大勇”等肉麻的吹捧感到为之齿冷，认为依照陈伯达的逻辑，“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殊不知这正是历代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一贯特点，只不过，有的是靠消灭肉体来扼杀思想，有的是以洗刷头脑来消灭思想，后者固然可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有时却远比消灭肉体还更可怕，因为作为思想者，往往惧怕的不是自己肉体的消失，而恰恰担心的是思想的退化。像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并没有吓退蔡元培、鲁迅，他们反倒敢于更勇猛的战叫，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卑骨；而李公朴的被害，激发出闻一多的拍案而起，留下了“向我开枪吧”的愤然长啸；胡风先生几十载牢狱生涯，酸辛苦辣倍尝却仍九死不悔，未改初志，令人感慨之余肃然起敬；马寅初为新人口论与当时最高的理论权威相抗争，甚至对周恩来让其检讨过关的良苦相劝也予以婉拒，铁骨铮铮，思想者的这种品质，造就了知识分子关怀终极，不断探求的人文精神，赢得了后人的钦敬与赞颂。然而当洗刷思想，个体的见解与观点不能让社会得以知晓的时代，社会就失去了这样的英雄，因为在此时，你或许可以暗地里思索，却没有任何发表自己观点的场所与条件，思想也就无形中受到了禁止与扼杀，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恐怕至今仍对那一个接着一个无休无止的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以致这段令人震悸的历史成为某些人讳莫如深的话题，时到思想解放二十多年，一提起这段时日，仍成为某些人心中的禁忌。我不禁联想到日本民族在二战五十多年后不仅没有进行忏悔，反倒想抹杀或遮掩他们侵略中国的这桩公案，窃以为不愿认错，缺乏悔罪意识，或许是东方文化的一种共同情结，这令我倍感悲哀。

遇罗文一家的遭遇，其实说穿了，就是当把持思想意识的那伙人，自以为经过十几年的思想改造，在民间已不会再有异端，从而可以放心地以“大民主”手段来消除上层政治敌手时，遇到了民间的对抗。那时凡是能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不管你“文攻”也好、“武卫”也蔽7d，都是“好得很”，“造反有理”嘛，大不了是“革命小将犯错误”。可惜遇罗文一家偏偏要另扭一根筋，与当局者的思想相对立，尤其是遇罗克，竟然敢利用这种时机，大声呐喊着向社会传播与主流思想不同的声音，一篇《出身论》所提出的也绝非仅仅是个单一的出身问题，而是一针见血地将每一个体作为主体，对作为公民每一个体所具有的具体的公民权利予以明确的阐述，从而震动了社会，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与支持，这是当局所始料未及的。于是他们不得不对自己曾吹嘘的所谓“大民主”进行曲解，以便绞杀一切危及自己思想统治基础的暗流，以防止这种非官方的思想演变为社会的主体意识，遇罗克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遇罗克的死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命运规定，对于一个当时还是青年的生命个体来说，这无疑是最惨烈的悲剧，但对一个思想家来言，这可能又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缘，由此奠定了遇罗克做为思想先驱的历史地位，其所宣扬的人权思想不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人们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支点，而且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一再提及的主要话题，成为这个新世纪中国人民把自己从普通百姓演造为社会公民的思想基石，对我们这个灾难深沉的民族来说，遇罗克的人权意识无疑是一份最宝贵的遗产。

遇罗文一家，为争取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付出了遇罗克生命、几口人入狱的代价，因此而受牵连的绝不仅仅是他们一家。面对这惨痛的牺牲，遇罗文先生客观冷静地对那个已经渐渐离他远去、离每个人都已远去的时代，作了追溯与回叙，对音容宛在的兄长、后半生一直在绝望与哀思中苦苦挣扎的父母，以及饱尝铁窗滋味现已不愿再返这片令人伤恸之故土的姐姐，作了悼记与怀念，但行文中少有悲壮，多见的却是冷峻；少有伤悼，多见的却是沉静；少有愤世嫉俗之语，却显见的是洗练从容，更深切地体现出作者思想的深邃与情感的真诚。正如丁东先生序言中所说：“他把主要的笔触都用于展示他的家庭和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经历过的苦难上面了。”因此，刚开始读遇罗文先生此书时，尚不能感觉到他那一家惨凄命运的悲凉，然而你却能够立即体识到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氛围、一种气息，你掩卷之时，泪水就会涌出，就会明白“在该哭的时刻我甚至学会了笑”，是一种何其辛辣又何其酸苦的讥嘲，一种何等悲烈的心境写照。

从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到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再到遇罗克“乾坤持重我头轻”，中国思想先驱者付出的代价实在令人心情凝重，我并不悲哀，但读完《我家》我的心却在泣血；我想为未来欢唱，但读完《我家》我却不能不为旧日而哭。《我家》虽说是讲遇罗文先生一家的境遇，但同时又是那个时期无数家庭不幸境遇的缩影，真实地说，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下每个不幸家庭的翻版与浓缩，但愿这一切永远不要在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度再发生！

□ 原载《民主中国》2000年9月号

∞ ∞ ∞ ∞ ∞ ∞ ∞ ∞ ∞ ∞

狱中遇罗克

• 张郎郎 •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马背摇篮”里长大，“根红苗正”的那代人，然后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最后进到北京，在共产党开国的时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育才”、“一零一”、“男四中”这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

我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现在，我自己决定回到中国，想要了解国内人的想法，倒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没有完成。我在海外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说我是向当权的屈膝投降，回来了。其实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这边。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写一些东西，想弄清楚大家心里真正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民族没想清楚，我自己也没想清楚，现在又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弄清这些。

我当时坐牢的罪名，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文艺界的学生中间，传起了关于三八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实际上，是因为文艺界对江青知根知底，关于文革，现在说都是“四人帮”的罪行，其实原因更复杂，大家的怨气都直对着江青，是因为她迫害文艺界的人比较直接。

当时，江青就搞了专案组，想要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与这些言论有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那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学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学一样，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又抓了几十位老师，都是用严刑拷打，然后让每一个人说出，你听见这些话是谁说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单位，都在做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这个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局”。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判，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怎么坚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是突然之间被抓起来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后来要给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慑力，就要给他们厘定更多的罪名。在这些手法上，和给遇罗克定罪的过程都是异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么，同最后给你定的罪名，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种说辞。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他倒是说对了，是所谓“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就是讲了江青最不爱听的话，还讲了当时领袖的笑话，还有对当时中央首长的行为做过评论、批评，都算是罪行。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说过中央首长一两坏话，有人证明，那就会被判死刑。当时，给我弄了一百多条这样的罪行，当然是枪毙几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条罪行是和后来判魏京生的说法一样的，就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就算是“里通”法国。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因为我是学西方艺术史的，想去法国留学，这犯了“阴谋叛国投敌”罪。我就是按照这三个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案情就是这样。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三个楼，像一个K字，叫做K字楼，是三层，我们被关在K字楼的二层，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号，号子里已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了，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我在四筒，他在二筒（还是三筒？）。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死刑犯。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K”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第一次抓我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

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

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

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

了。我仍被关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

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眯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后来，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总有这样的争拗。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说：“看过”。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吗？”

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

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

经过这一次，大家谈出自己观点的要点，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放松地交谈。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童年时代，他们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关系。谈及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大学，而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

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个牢房里都有几个被折磨的神经失常的人，他们也是遭遇最惨的人。有一个是当时的“北航”，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已经变得半精神病了，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个农民，因为说他骂了毛泽东就被关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戴大镣铐，人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不动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事。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轮到我的时候，他们说，让这个“联动”来管他，联动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们打个半死。当时，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像别人那么做，别人觉得我假慈悲。

当时遇罗克对他们的态度很特别，也不打他们，但是也不对他们好，完全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就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他还说，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会上时间长了，总是同情人就会被认为是“烂好人”，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上，我想遇罗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这残酷得多的，所以他不会婆婆妈妈。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个政治领袖？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

有时，我跟遇罗克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旁边摩拳擦掌，意思是我有什么不轨的话，他们就会一哄而上。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只是理论和观念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象棋。他下象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

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有多少人寄钱，或要求帮忙，有人想见他都没有机会。当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击他，这一点他很清楚。我说，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他说：“你们出够了风头，而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每个人都是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他指的是，当时中央文革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他们从中有了办报纸的空间）”。他们找到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所以他说，为了这他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新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连续开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楚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同。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人要纪念遇罗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长远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

从长远的方面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就像德国人一样，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德国人还要知道纳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优秀的民族产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好像在物质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的口头言论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出版这样一本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那个时代错杀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物质再丰富，中国还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严酷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在八零年遇罗克得到公开平反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时遇罗锦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我，接着是一些报社的记者跑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跟遇罗克在最后的时刻、在死刑号还在一起、并且愿意说出来的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当然，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不愿意说了。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进步了。因为八零年初的时候，虽然政府把“民主墙”从西单搬到月坛，但是整个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个可能性，街头大字报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经开始了。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中国说来是一件大事。

我当时马上给香港的《九十年代》写了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一开始，他们没敢发表，后来发了，就是现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罗锦也借用了我的一些资料。当时中国如果开始反省这些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很有希望，我以为这是一个理性的、往前走的过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来了，于是就变成遇罗克平反、魏京生被抓。

中国历史很有讽刺性。魏京生本来是联动里搞宣传的，他变成了向极权挑战的人；而当时出身不好的遇罗克，发表了《出身论》的人，跟张志新一样，被政府当作一个民族英雄的形像来宣传。这件事有它让人激动的一面，也有让人沉思的一面。那时宣传遇罗克是真的想彻底反省这件事，还是仅仅是一种需要？实际上后来我发现，对于遇罗克的宣传时间很短，没有深入地讨论，因为如果深入地讨论，进一

步谈“一打三反”运动的过程，就会谈到那时杀了多少因为言论、因为思想获罪的知识分子，大部份经过正式宣判，还有一些在没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这些人和第一波红色恐怖时被打死的人不一样。红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斗，死的是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杀死的人，都是政权所不喜欢的人，是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杀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这些事情谈透之后，中国人才会知道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社会意义，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九八零年，遇罗克的事情才说了几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没有人把“一打三反”，这个箝制言论、扼杀思想的顶峰拿出来批判。好在“一打三反”没有延续得太长。否则，不知要杀死多少人！

谈到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不足，我认为，如果真的从理论上来谈遇罗克这件事，这本书出版就会很困难。所以，它还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啊、“四人帮”制造的事端啊，这些提法上。当然，事实远远不是这样。我曾经想过，要从现在的角度重新写遇罗克，但是，让人感到悲凉的是，像《九十年代》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那我写这样的文章能在哪发表，谁还会去看？我拿着这本书给现在的年轻人看，他们翻了翻，第一个反应是，那时候你们怎么那么傻？意思是，那么错的事，你们都站出来说话不就成了吗？我就只能说，那时候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坏了；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是，那是真的吗？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为他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了。但是，这些你不能跟他们辩论。

我觉得纪念遇罗克应该从更深层来说，救救这个民族！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文化上弄明白，现在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不是唯一活着从死牢里出来的人。跟我一块儿出来的还有一个姓周的，他和我是一个案子。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他不但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许别人提他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回忆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痛苦，谁要是提起，就是用人们的痛苦来赚自己的钱，或者赚自己的名声。也有别人对我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不光他一个人这样说。但是，我这些年来写的都是这些，已经快要变成“监狱文学家”了。其实靠这个既发不了财，也出不了名。

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号我进到死刑号，遇罗克大声和看守说话，暗示我们真相以后，当时每个人都被震惊了，那个时候走廊里面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每个人都处在临死前，进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们听见狱卒进了房间，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刚下完雪，他把牢房门关上了。我们都轻轻地提着脚镣和手铐站起来，每个人都贴在自己的那个小窗户上，互相开始叫名字。这时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说《乔迁喜面》，写的是，本来人们为了庆祝乔迁之喜要吃一顿面；共产党员在监狱里转监的时候，会开一个晚会；我就提议，咱们做一个临别的晚会吧，大家都同意，然后我们就轮流唱歌，当然是以很小的声音。但是，牢房太静了，只要一个人唱就都能听见。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声唱了起来。这时候，看守就冲了出来，大叫“谁？”我们赶紧躺下了。他过来查，我们都假装睡着。后来就变成这个晚会很滑稽，他跑回去，我们就躺在床上大声唱，他出来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经跟遇罗克一起唱过的歌，包括《光荣牺牲》这首歌。

我可以说，遇罗克是比我更正统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哲学的整个框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之后的国家与政权这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他想起这些歌的时候与当时的处境有关，那时他戴着很紧的手铐，吃完饭，手就会肿胀，非常难受。那天吃完晚饭，他就跟我谈起来。那时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

传说，斯大林最喜欢的歌是《苏里柯》，格鲁吉亚民歌；列宁最喜欢的歌是《光荣牺牲》。我因为过去一直学外文，喜欢唱外国歌，俄罗斯歌差不多都会。遇罗克问我不会唱列宁喜欢的《光荣牺牲》，我说，会。这是一首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歌曲，我们就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监狱中的老头都哭起来了，因为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大家都有一种带入感。

在死刑号里的第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孩，忘记他叫什么了，可能是因为偷越国境到当时的北朝鲜，被北朝鲜当局送回来了。看他岁数小，我对他说，你出去的机会最多，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最后我们没有难过，最后我们挺开心的，还一直在唱歌。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希望外面的人不要为我们难过。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说，看来咱们活着出去的机会不多了，咱们以后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块儿的时候，互相让着点。遇罗克也跟我们搭茬儿，他好像说“殊途同归”之类，具体我记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遇罗克也唱了。

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两个人没有被枪毙。他们曾经到北京看过我，大家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次狱中晚会。但是，他们因为有各种考虑，不愿意谈这些事。

遇罗克个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进监狱的时候，是十一月，监狱里还没有生火，很冷。他戴着一顶栽绒的棉帽，就像解放军戴的那种。监狱里的老工人叫他冬瓜脑袋，因为他的头有点平行四边形，有些秃顶，戴着黄框的眼镜。他说话嗓音有点尖，慢条斯理，写字受魏碑体的影响，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但是钢笔字不如他写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记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是我始终没有的，到现在我还没有。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的使命感，这使命感比较明确，就是要为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鸣不平，为这些人争取应得的权利、地位，实际上他也是在争言论自由。

我本来应该从监狱出来好好作生意、去发财，或者做一个闲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什么事，比如“民主墙”、“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是遇罗克的使命感使我觉得，本来我没有使命，但是这么多人都死了，他们想要做的事，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深层中是一样的，我就希望中国好，我要有实际行动。遇罗克的这种勇敢，对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画画。定我们为反革命集团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一起成立写诗的组织。当时，一有组织肯定就是反革命组织。我对于政治、道德勇气，过去没有这方面动力，也没有这个要求，可以说遇罗克和跟遇罗克一样的很多人，在这前后献出了生命的人，对我说来是一种鞭策。并不是他们要求我这样做，而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更宝贵的？我们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本来“六四”的时候我可以不管，可以不站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后来一样，我在海外写一些文章，回来不断地有麻烦、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言论和思想，那我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会想到遇罗克和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活着会怎么做？我虽然不是理想主义的先驱、同道人，但我是一个还能说话的人，我应该多说一点，就是这样。

□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

∞ ∞ ∞ ∞ ∞ ∞ ∞ ∞ ∞ ∞ ∞

遇罗克和他的时代

• 张敏采访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99年3月5日出版了由徐晓、丁东和徐友渔合编的新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遇罗克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因撰写《出身论》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执行，年仅二十七岁。”以下摘自记者采访对《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编者、原《中学文革报》主编，以及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等的采访实录。——编者按】

◇ 徐晓（《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编者之一）：

去年（1998年）八月份，我和丁东，他也是这本书的编者之一，在一起谈论遇罗克这个话题，他提到，有关遇罗克是可以编成一本书的，感到这件事早就应该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徐友渔，他也是研究文革史的专家；还有宋永毅先生，他去年八月份正好从美国回来，提供了很多资料。另外，我们还通过国内的朋友找到许多资料，很快就把这本书编完了，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吧。

我们三个人分别写了《编前的话》、《序言》和《后记》，那时候，我们没有找到遇罗克的家属。后来，丁东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遇罗克是谁》。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看到后，设法找到了我们，我们因此得到了遇罗克的照片。我们这本书的结构是：有十一篇遇罗克的文章，包括他当时在《中学文革报》发表的，以及他在文革之前，一九六五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有遇罗克的一些日记。另外，因为他的文章很多都是论战性的，是反驳对立观点的，为了说明遇罗克文章的背景，我们选了十篇评介性文章作为附录。此外，还有七篇回忆文章，加上三篇评论。同时，附有二十四幅遇罗克以及他和家人的照片。这样，这本书就比较完全了，这也是我们感到欣慰的地方。

遇罗克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很小，刚上小学，我是后来才知道遇罗克这个人的。那大概是在一九七二年，我认识了一个朋友，赵一凡，他是一位民间思想者。他当时收集了很多有关文革的资料，同时还收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民间文学。他跟我讲了很多文革的事情，其中就谈到了遇罗克。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讲到一个女孩子叫郑晓丹，他给我看了郑晓丹的照片，这个女孩子是因为为《出身论》辩解，最后被整死了。在我认识的人中，这么直接地讲到一个人因为思想观点而被整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时我很年轻，孤陋寡闻，但是这件事在我脑海里印象非常深刻，我还听说郑晓丹曾经追求过赵一凡。说来很巧，后来郑晓丹的妹妹郑红丹在一九七五年、七六年的时候，与我和赵一凡被牵涉进同一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案中，同时坐牢。

后来郑晓丹平反的时候，赵一凡也付出过很多努力，平反材料都是他帮助写的。赵一凡后来病逝了。我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这本书时，觉得也是在为我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赵一凡，帮他做一件事情，因此我在这整个过程中是满怀著一种激情在做这件事情。

赵一凡一九三九年出生，他的父亲是老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他一直跟著他的父亲转战南北，由于劳顿，赵一凡瘫痪了，他一共睡了十年石膏床。他基本上没上过学，全是靠自学。他的下肢几乎全部瘫痪，只是凭著毅力，拄着拐走。文革前后，赵一凡曾在儿童出版社做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后来别人都转正了，他因为身体不好，还是临时工。以后，他就离开了出版社，成了“待业青年”。他的周围经常聚集着很多学生，虽然他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中学的学生，但是很多中学生都喜欢和他来往。他住的地方就像是一个文学沙龙，很多当时被禁止阅读的书籍都在他那里传递，大家在他那里互相交流思想。



赵一凡的一大功劳是收集了很多文革中地下文学的资料，例如：北岛、芒克、郭路生，他们自己写的诗都丢了，赵一凡都给他们抄录、翻拍，保存得非常完整，他在民间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事赵一凡被关了两年监狱，放出来以后身体更加不好，在一九八八年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才五十三岁。

◇ 牟志京（《中学文革报》创办人和主编，现在美国）：

当时，《中学文革报》的很多人都受到了迫害。其中遇罗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他还有很多人都付出了很大代价，许多人被关押，在学校里被殴打。在《中学文革报》出版的第一期到第三期之间，出于幼稚，我坚信中央文革会支持我们。但是，出到第三期的时候，中央文革派了信使，特地来告诉我们，用的是要我们“悬崖勒马”这个成语，说我们大方向错了。他们说得很清楚，“是关锋同志（中央文革成员之一）让我们来告诉你们的”。

这对我当然是个很大的打击，当时我就召集了一个《中学文革报》报社的会议，直到现在，这仍是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在会上，我讲，现在看来，如果我们继续把报纸办下去，就是以鸡蛋碰石头。如果说以前咱们有幻想的话，现在是该重新思索的时候了，每个人都有权利作出选择，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谁说退出这个报纸，别人都不应该抱怨。让我很感动的是，没有一个人退出。大家都是抱著一种牺牲的精神去继续把《中学文革报》办下去。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发表讲话，说《中学文革报》是反动报纸，《出身论》是大毒草。公安局没有马上插手，他们是后来慢慢进来的。

接下来就是十几年的残酷迫害、杀害遇罗克，直到一九八零年光明日报发表王晨《划破夜幕的陨星》这篇文章开始，各大报刊都登出有关遇罗克的文章，把他当作正面的英雄。我那时候曾经再一次召集原来《中学文革报》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在那次会议上，我才了解到一些报社成员所受迫害的具体情况。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报纸的一个成员，也是遇罗克多年的好朋友——郝治，他被关押了很久，受到很多殴打。还有我们报纸的另外两名立下汗马功劳的成员：一位是李金环，另一位是纪亚琴，这两位女士负责处理信件。当时我们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因为太多，邮局都拒绝给我们送，这些信件都是由李金环和纪亚琴处理的，她们文革前是北京气象学校的学生，后来也被关押。很遗憾，至今我们没有能够再见面。被关押的当然还有其他成员，遇罗文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和王建复也受到公安局多次盘查。也许我还应该讲到我的小学同学，他叫朱大年，就在这次《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新书首发会的座谈会上，他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当年第一期《中学文革报》的印刷、出版所用的介绍信，就是他帮我从“三司”（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开出来的，他后来也被关押。

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一提，就是《中学文革报》的读者，他们中有些人也受到了很重的迫害，许多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显示的精神，现在回想起来，仍很值得钦佩。

◇ 郑红丹（现在美国）：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人大附中上学，读初三。因为我们人大附中学生大都是干部子弟，我出身不好，就显得很突出，成了“狗崽子”。周围同学都是红卫兵，只有我这一个“黑五类”，他们对我就特别歧视，所以我就回家了。我家因为

我爸爸是右派，六六年三月份就被遣返到河北邢台去了。在所谓“红八月”，家里经历的腥风血雨对我们家人的心灵都有很大震动，到一九六六年底，我就跑到北京跟我姐姐晓丹住在一起。

我还记得很清楚，很冷的一天，大概都已经数九了，我们在一张大字报上看到一份小字报，是《中学文革报》上登的《出身论》，作者就是遇罗克。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打动我的心，我和姐姐都认为这才是替我们说话的人，我们非常感动，就四处去找，找来《中学文革报》，把每一期都好好保存起来。我们还把《中学文革报》寄给哥哥、妹妹。我爸爸也读了这份报纸，我想他更理解出身对于子女的影响，他内心一直充满自责和内疚，他常跟我们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临上吊前对他的孩子说，“世世毋生帝王家”，意思是，你们只是因为生在帝王家才受了这么大的罪。我的父亲是说我们因为误生在右派家才有这么多不幸。我觉得，我父亲因为出身问题承受的压力比我们还大，所以他一直珍藏着《出身论》。

我姐姐在学校里受迫害的时候，赞成《出身论》是她的罪状之一。说到我姐姐的死，我不知道详情，因为我当时也在学校受隔离审查，被关起来，根本没有自由。一九六八年十月前后，有人好心告诉我姐姐死的消息。我听了以后，有一种天摇地动的感觉，那人当时没有仔细讲事情的过程，后来很多关心我的人逐渐告诉我一些真相。

那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郑晓丹被关押起来。她遭到秘密刑讯，审讯者要她交代宣传《出身论》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凶手们折磨她，先是饿她，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她说“饿”，凶手们就把二十多个窝头端到她面前，逼她立即全部吞下去。她吃了几个窝头就吃不下了，凶手们就按住她的身子，朝她嘴里硬塞，塞进去，她吐出来，再塞进去，又吐出来。凶手们要她交代问题，毒打她，打得她眼脸浮肿，什么也看不见了。凶手们还把拴着几十斤重物的铁丝挂在她的脖子上。郑晓丹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她被送到了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不收，又把她拉到公安医院。路上，她突然苏醒，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呼唤：“妈妈这是块什么地方啊？妈妈！”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清晨，年仅二十岁的郑晓丹被迫害致死。

更多的事情我就知道了，我和我姐姐年龄相差一岁半左右，我们一起长大，我母亲每天上班后，姐姐就照顾我，我也习惯于依赖她，我胆小，都是我姐姐替我跟外人打交道。我姐姐跟我不一样，她喜欢唱歌，嗓子非常好，而且她对于美的东西特别敏感，结果她二十岁去世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常常梦见她，我总不敢相信她不在了，我总是想，她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也许嫁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早晚會回来。

我父亲特别敬重遇罗克，他向遇罗克的妈妈要了一本遇罗克生前用过的字典，一支遇罗克的钢笔作为永远的纪念。遇罗克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怀念的人，在那种红色恐怖之下，他敢于说出一句真实的话来。遇罗克明白，他如果把实话说出来，他会把他的生命也付出去，他知道这样的代价，但他还是要坚持真理。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维护人权去牺牲，他读了很多书，他是很理智地这样做。尤其是在那样的时期，人人都在明哲保身，甚至在出卖别人的时候，遇罗克却能坚持他认识到的真理。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的血没有白流。

◇ 宋永毅（文革史研究学者，现在美国）：

我是“上海中学”六六届初中生，老三届，我实际上从文革时期就开始收集这方面资料。遇罗克《出身论》发表的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当时《中学文革报》每一期我都跑到西单去买。因为文革期间我参加了上海反对张春桥的“中学运动联合会”，我被三次抄家，遇罗克的材料第一次全部被他们抄走了。那时候，我和我的

一些同学就有一个共识，就是文革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流行的所谓“反动思潮”，虽然被压下去了，比如遇罗克就被枪毙了，但是这些还是中国社会中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思潮的有关文献保存下来。我们有好多同学牵头，把当时手头有的材料刻印了两本，大概有四、五百页，叫作《思潮集》。我们连夜油印，目的是为了送给那些到乡下插队落户的同学带走，作为研究文革的资料。

后来我一九八九年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就把这本东西带到美国。我想，总有一天，我要重新研究这些还没有解决的思潮。我有一个梦，要让大家知道文革中间有那么多异端思潮。后来我们整理出版的，就是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有关《中学文革报》的部份，是原《中学文革报》主编牟志京先生提供给我的。然后，我又访问了所有我能够访问到的《中学文革报》的编辑。

我认为，这是流散了的中国当代思想史。忘掉历史的民族是很可悲的民族。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看这本书也需要用历史的方法去看。

在文革年代，《出身论》能够正式发表成为铅印的东西，就需要很多伪装，很多马列的词句等等。如果看遇罗克的日记，他一开始就对文革持批判态度，对破四旧，对红卫兵，对所谓的学习毛泽东著作，都持一个批判态度。他的批判是对这个制度的，是对文革中所掀起的那种青年法西斯文化的批判。《出身论》当年甚至在西藏、新疆都非常流行。

在我们“上海中学”的校园里，《出身论》被人抄成大字报，整整五十四张，贴在校园里面，后来被那些高干子弟的红卫兵复盖掉，第二次又有人再抄五十几张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群众基础。

自遇罗克的《出身论》面世至今，我们脚下流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垫高了我们回顾历史的支点，以致不少理论家们黯然感叹：原来遇罗克为之献上他年仅二十七岁生命的，只是今天的常识而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一种“常识”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常识，大多经历过巨大的历史阵痛。尤其当常识违背了当权者集团的私利或身处反常岁月之中，超前认定他们是常识的先驱者，常常会付出流血代价。一种真实的常识的提出，常常是对另一种虚假“常识”的颠覆。

回过头去看遇罗克所提出的出身问题，即不同出身的人应该有平等的选择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的词典里的常识是另外一套，讲穿了就是血统论。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谁敢说，我和一个出身高干的人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有平等的公民权，有平等的“提干”机会？谁敢讲这个话？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更不用说文革初期的那种红色恐怖煽动了大批无知青年，尤其是高干子女，他们要抢先接班。所以有人说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是一次流产的太子党的政变，他们要跨过一切藩篱，比如原来还有一个高考，有分数线，他们全部取消，要直接成为当然的接班人，成为青年法西斯的特权阶级。他们对于文化的毁坏，破四旧，惨无人道地杀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仅北京地区被活活打死的人就将近两千，这还是公安局的不完全统计。

而遇罗克所有的文章，核心就是两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所以我评论遇罗克的文章就取了一个题目：《黑暗中的人权宣言》。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黑暗王国中一份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而这也正是当权者最不能容忍之处。

我们还可以把遇罗克和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比较一下，周恩来是主张查三代的，他说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小职员，但是他的祖父是封建官僚，所以他填的“成份”是“封建官僚”。当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跟他说，看父亲你可以填“职员”，周恩来说：“我才不呢，应当查三代”。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老是在忏悔自己的出身，无限地夸大，他在青年中造成的是什么影响？对那些“血统论”的捍卫者和提倡者，当时的谭力夫、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当时的“老红卫兵”，毫无疑问是一个劲鼓动。所以，我认为，“血统论”本质上是中共的阶级路线，只不过那些老红卫兵是不聪明地把它挑明了而已。

但是遇罗克不像很多出身不好的同学被这个“常识”所迷惑，我们当时也被迷惑了。遇罗克承继了人类知识、文化的精华，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相比，遇罗克的思想超越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常识”。

如果说“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批判的良心”这一命题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的话，遇罗克在那个黑暗年代的所作所为正是一个中国知识者的楷模。可巨大的历史讽刺是：在如磐暗夜中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自三、四十年代便声名显赫的文坛世匠或科学大家，而是遇罗克——一个只有高中学历，年仅二十余岁的学徒工，以遇罗克的年龄、学历和身份充当“社会批判的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且承担得如此出色，实在是疯狂年代中的历史反常，和遇罗克个人的不同寻常。然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却不仅是历史的嘲弄，而且是一种良心的拷问：尽管他们有傲人的学历和复杂的专业知识，但他是否缺乏分辨简单是非的常识、提出并坚持这种常识的勇气？如果一个知识者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常识，他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不仅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即使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

遇罗克超越了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超越了他个人的社会地位，他关心的是整个知识阶级应当关心的事情，他承担了太沉重的历史、社会负担，结果他倒下了。我们觉得很痛心，很可惜他那么年轻就被扼杀了，否则，在我们民族当代思想史宝库中，会有更多的文献。

关于遇罗克之死，有些高干子女说，处死遇罗克是有关的中央首长批示的，是位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长。数一数当时中央里出身不好的有周恩来、康生、江青……，而这些高干子弟向我暗示，是在出身问题上很计较的那一位（可能是谁大家都知道了），他批示枪毙遇罗克。我们假设他们说的是真的，当他在写下枪毙遇罗克的指示时候，他已经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因为遇罗克讲出来的话对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应该是更容易接受的常识，对不对？无论这个人是谁。

中央首长中出身不好的人多得很啊！

这就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被残酷的党内斗争扭曲成什么样子。这个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及存在于人们心里的不平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主义”是多么可怕。

目前的中共太子党中，我们比较熟悉的现在的掌权的人，有些也是当年血统论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小的权力，他们已经发了很大的财，不管是从权方面，还是钱方面，他们对当今中国唯一的贡献，我觉得就是使得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主义、这个制度的糟糕。而这些人背景还是遇罗克所反对的不平等，他们凭借他们的血统自然地占有着国家的资财、国家的权力，这种现象应该说在中国还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是巧妙啦。

□ 摘自《民主中国》1999年6月号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